

◀ (上接6版)

防之,其略有云言路目为准党,金壬恶其清流云云,闻之焦急,当又托人告知此等情事,与之婉商可否暂居苏杭。又托友人邀之同游金焦,渠皆不听,转因之甚怒,谓晚将渠驱逐。嗣后联仙(元)、于次棠过金陵,皆自出己意,劝其勿住江南,因渠所居乃合肥之他宅,合肥之子有一房亦在金陵,两君意兼恐渠受合肥之累,故力劝之。渠谓两君皆受晚指,代为驱逐,益致怒不可解。幸冬间晚已有回楚之信,群谣渐息,然蕙斋始终不悟晚相爱相为之苦心。及交替在在,有日亲往拜之,并与约谈讫,数日坚辞,不肯相见,亦只可听之而已。半年以来,闻其议论,大指似于时事大局及身世艰虞仍未了澈,深为焦急,诚不解其十二年忧患艰危,动忍增益,何以仍只如此?晚于蕙斋最为惓惓,因时人诋之太苛,厄之太甚,深为愤懑不平,而自处孤危,力不足以援之,每与人谈及辄为力辨,惟盼其收效桑榆,一洗前耻,杜此谗口,吐此闷气。今看此时局及渠情形,以后事体殊未可知,言之怅然。

若按之洞所言,他自己也有官场苦衷。但在佩纶看来,之洞是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。现在两人,一个宦场得意,关心着自己下一步目标,不愿被无端的谣诼搅和;一个归隐江湖,只在乎张之洞的态度,这样就将双方的关系逼到无法退让之地步,这是张佩纶性格中的猖狂和耿直,也反映出张之洞的巧滑和闪避。这两封信件的发现,对于研究二张关系,是十分宝贵的史料。

戊戌年间,张佩纶曾对梁鼎芬说:“孝达内召过此,皖芜两电约鄙人登舟一谈。时方有新参之说,迎送者如蚁。虽系旧交,岂能出谒?东坡黄州赦还见半山,有‘岂可以野服见丞相’语,亦是半山造舟中,非东坡诣第第。时半山已罢相,坡老尚斤斤如此,况鄙人今日乎?”(张佩纶:《致梁节庵太史》,《涧于集·书牍》卷六,第24页)这里看出,佩纶虽然失意,却将自己比作苏轼,而将之洞比作王安石,依然不肯躬身退让以减身份。二十八年九月,清廷命张之洞再次署理两江总督,两个月后,忽调云贵总督魏光燾继任。张佩纶告张人骏:“香(涛)进退维谷,一切生事之徒均皆扫兴。午庄(按:指魏光燾)未知何如。而金陵士民痛恨香翁,几如酷吏。”可见他对张之洞的观感越来越恶。

据陈宝琛记载,张之洞这次到宁,欲见佩纶,佩纶仍以身体不适而拒绝。直至除夕,方才见面。张之洞“就君纵谈身世,累欷不已。既而叹曰:‘不得为廉生,命矣!’”他们想起了从前的共同朋友,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自杀殉国的“青牛肚”王懿荣。又过七天,佩纶因病去世,两个当年政坛上所向披靡的“青牛角”,在张佩纶临终之前,终于相会。而相较中法战争时,两人同随李鸿章巡阅北洋水师后挥手告别,前后相接近二十年。

竹林酒熟忆朋欢

姜鸣

张佩纶年轻时,以笔作剑,横扫天下,犹如“太阿出匣,光芒逼人”(李鸿章语)。同时也倾心结交朋友。从光绪初年起,张佩纶与京师翰詹科道中的才俊之士广泛交游。其中最密切的,有吴观礼、陈宝琛、陈启泰、黄彭年、黄国瑾、王懿荣、于式枚、梁鼎芬、许景澄等等。在“张藏信札”中,留下他们私人交游、学业切磋、诗歌吟哦、政治谋划的丰富内容。

吴观礼年长张佩纶十五岁,曾入左宗棠幕府,参与平定新疆之役,较早涉入军国大计。与张佩纶同年考中进士后,开始在北京交往。他写诗歌《冢妇篇》《小姑叹》《天孙机》《邻家女》,分别隐射恭王、左宗棠、沈桂芬、李鸿藻、翁同龢、潘祖荫。他有政治抱负,有幕僚经验,又有文学才情,和张佩纶一见如故,自谓“论交与我最深潭”,又说陈宝琛“卷麓才气自无双”。章士钊后来将吴观礼、张佩纶、陈宝琛三人称作“翻联三士壮同光”。(汪辟疆: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》,《汪辟疆说近代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191页)他死于光绪四年的赈灾染疫,未及参与后来勃兴的“清流”功业。死后张、陈为他编撰《圭盒诗录》,陈宝琛亲笔手写,张佩纶校刊。有关吴观礼的史料,以往较少存世。这次在“张藏信札”中,公布了吴观礼与张佩纶的往来信函和其他文翰,总数达217件,可供研究吴观礼的生平,和张佩纶光绪初

年在京与友朋交往的情况。比如某次,吴观礼向张佩纶转赠“南友”寄来的“兰腿二肘、旨姜一瓮、茶叶二瓶、菊花二匣”,外加漳袖一枚,橘子四枚,这些便笺为当年友谊之真实记录,吉光片羽,皆可宝之。

陈宝琛是张佩纶一生的挚友。“清流”依附李鸿藻,属于“北派”势力范围,宝琛是南人,却一直与佩纶同气连理。在朝时,两人在许多政治议题上联袂出手,互相呼应。在野时,也一直书翰不绝。比如交流上层秘闻,光绪七年三月,慈安太后忽然薨逝,李鸿章从薛福辰处得到密报:“东圣是日小有感冒,服太医庄守和大黄、芒硝一剂,大泻,覆壅而崩,并未召诸医合方,痛哉!”立即转告张佩纶,佩纶亦随即与宝琛分享此绝密信息:“刻合肥书来,云误服庄守和大黄、芒硝重剂,一夕大泻,痰涌而崩。昊天不吊,降此鞠凶,尚何言哉?”又如人员推荐,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七日,张佩纶致陈宝琛函中提到:“严宗光闻执事在合肥前举之,定是奇才,已累书向黎召民调令来津,召民初不愿,以有事为辞,现允。竣学生出洋后,令其到津,当可甄拔。但严乃精于西学,并非长于水师,亦祇能令其在学堂作师耳。”严复从伦敦留学海军回国之后调往天津水师学堂执教,恐怕未必知道是陈、张在幕后为其运作。“张藏信札”中公布了二人往

来书信689件,此外还有陈宝琛致王仁堪、王仁东、林炳章、陈宝琛、张志潜书信93件,对于张陈关系和“清流”课题,都是十分重要的新素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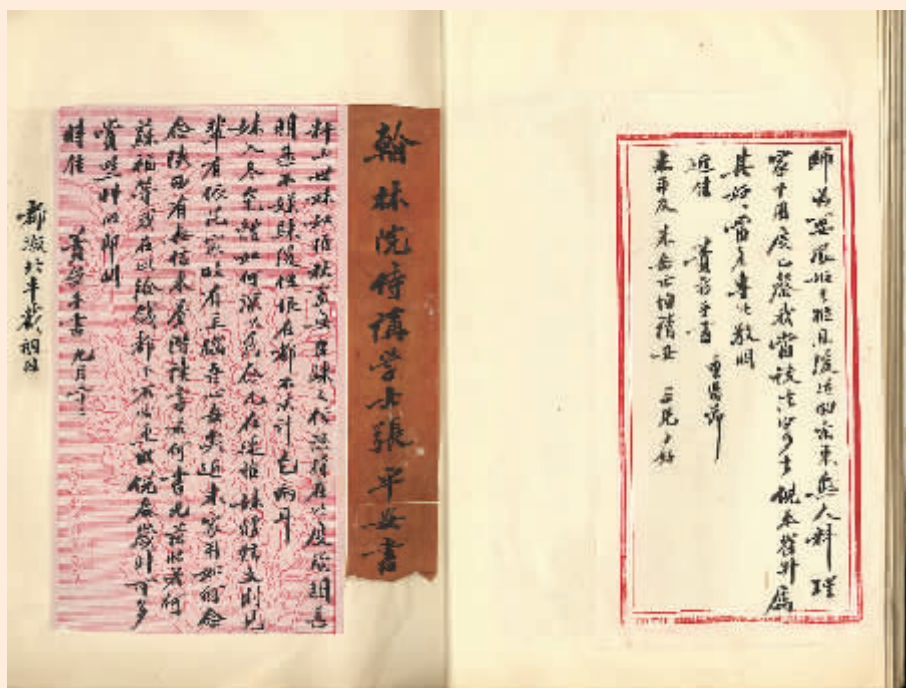
在张佩纶与陈宝琛通信中,有许多涉及中法战争时福建及两江地区布防、作战的情况,以及对李鸿章、曾国荃、左宗棠等人的看法。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二日,张佩纶被革职,进京听候查办。时宝琛丁忧回籍,佩纶赴螺洲陈府告别,两人物叙契阔。二十七日北发,宝琛拏舟送至洪塘小金山而别。此后两人处境相似,“同是天涯放逐臣”(张佩纶:《伯潜舟中同宿》,《涧于集·诗》卷二,第14页),此后往来书信不绝。光绪十四年四月,张佩纶赐环,陈宝琛作诗致贺:“观棋闻又入长安,金玦三年信誓寒。雨夜梦回疑妇叹(按:边夫人于张佩纶谪戍次年没京师),竹林酒熟忆朋欢。肯将龟策从詹尹,悦爱钟鱼对懒残。住惯烟波怕尘土,停云直北奈迷漫。”

这封诗笺是张陈友谊的见证。诗笺没有裱托,是一张薄薄的陈年旧纸。我捧读诗笺原件的时候,似乎能够感受到两位前辈的气息和脉动。

张佩纶早年的朋友中,王懿荣、王崇燕父子,黄彭年、黄国瑾父子,陈启泰、章洪钧、奎斌等人,也与他保持了终身的友谊,“张藏信札”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往来书信。在张佩纶

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都给予了支持和慰藉。于式枚曾是李鸿章的幕僚,有关奏章文牒多出其手。他比张佩纶小五岁,故彼此以“六兄”“大弟”相称。张佩纶光绪十四年娶李鸿章女儿李经璠为妻,寄居天津相府,与于式枚过从甚密,两人也经常往来书简、切磋学问、交流信息,直至甲午战启,张佩纶被逐出天津,于式枚陪同李鸿章马关议和,而后又参与辛丑议和。张佩纶与他的通信,流露出对政局的关心,和自身的态度。就数量论,前后达828通之多。这些书信,也透露出官场秘辛,值得细细阅读。

张佩纶与家人的通信也颇为珍贵。其中包括他与侄于张人骏、姐夫宗得福的通信,透露内幕和心迹甚多,与内兄朱溥的通信,谈家事、政事,也涉及收藏第一位岳父朱学勤的结庐藏书。在会办福建海疆期间与病中为他焦虑担心的夫人边粹玉的通信,情意绵绵、竭力安慰,让读者感受到张佩纶在国事危急中不为人知的家庭情怀。光绪十年六月初,他在给张人骏的信中讲到,上月“廿七日得合肥电,法定廿八日取马尾;即于是夜冒雨进屯,以救船局。敌本虚声,亦即中止。今退去两艘,吓我不动,去吓老穆(按:指穆图善)矣。省城人心皇皇,督蓄匕首,盐道买精金备走。友山(按:指福建巡抚张兆栋)与有年谊,劝勿出军,然佩纶安能已哉?但此举本不计利钝,以尽吾事。前敌涣散,船局孤危,均不能持久。南北援船不至,仅粤有两船将来”。但在给边夫人的信中却说:“兄见驻马尾,看山饮酒,静坐读书,较在省尤适。闻六月十日和约可定,届时兄拟乞假回都,亦未可定。如不准,则八月以后必逐卿及诸儿也。”迨至流戍边城,他依然坦荡地安慰夫人:“富贵本身外之物,粹亦尚能看破,贵在此距都城止四百里,与在家无异,而免应酬之烦,免差使之苦,深为适意。”还说:“策罢官遣戍,所谓自我得之,自我失之,毫不介怀。……惟念及闺中因我忧思成疾,辄悒悒不乐。”阅读这些书信,能够真切感受到这位曾经挥斥方遒、指点江山的书生之曲折人生,“何意百炼刚,化为绕指柔”,可为一叹。



张佩纶与边夫人通信